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 ——宋代士人政治文化论析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练家伟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方美富老师

呈交日期：2011年11月2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 IV
致谢	V
前言	1
第一章 欧阳修为政态度与宋初政治	4
第一节 《旧五代史》与北宋政治	4
第二节 《新五代史》与北宋政治	7
第三节 欧阳修以《新五代史》揭开朝廷真相	12
第二章 《新五代史》的史学观	17
第一节 欧阳修之春秋学	17
第二节 善寓褒贬书法.....	21
第三节 《新五代史》求实精神.....	25

第三章	欧阳修的正统观.....	29	
	第一节	正统观之发端	29
	第二节	正统观之新义	33
	第三节	天人相分的思想	37
	结语	41	
	参考书目	43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
——宋代士人政治文化论析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AAB01235

日期：

摘要

本文开端以探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撰写动机，籍此来勾勒出整个北宋的政治面貌以及这个时期史学的特色。他撰写的《新五代史》与之前的官修《旧五代史》思想背景都不尽相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因素，我以其中的撰写背景差异来分析这段时期政治思想的特色，从而带出这段时期士大夫的政治观的转变。

在第一章里，我会分三个部分讲述北宋初及中叶统治者所面对的情况。第一节讲述赵匡胤登位后，对现状犹感不安，深怕自己重蹈五代之尘。认为必须从史书上得到借鉴，为巩固其政权找出一些依据，另一方面又提倡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实行重文轻武来改革唐末五代方镇太重的弊病。第二节是分析北宋中叶士大夫政治观与宋初的差异，我会以欧阳修撰修《新五代史》的背后动机来带出士大夫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观。在内忧外患下，士大夫自觉性地激发起忧患意识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而表现在其史作和政治里又是如何。第三节是讨论在北宋较为开放的时代气氛里，如何影响着欧阳修运用文学上的“文以载道”的观点来撰写其史。另一方面，欧阳修如何借其《新五代史》的内容揭开朝廷的政治内幕。

在第二章里，我会以欧阳修的春秋学为题，探讨春秋学的兴起、欧阳修借助其《新五代史》里的春秋书法来善于褒贬及其不没其实的态度。第一节里，我会论述春秋学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而为北宋时所用，后以孙复作为北宋春秋学兴起的

先驱及启发欧阳修的春秋观，进而影响到其史作方面。第二节我会先论述孔子时代的春秋书法，而为欧阳修所用，其善于褒贬的词汇便是取之孔子的《春秋》。第三节讨论《新五代史》里欧阳修不没其实的书法与《旧五代史》书法之间作比较，后以各人对欧阳修不没其实的态度评论作一个总结。

在第三章里，我会以欧阳修的正统论为题，探讨正统论的发端，后以欧阳修为之重新作诠释。在第一节里，我会论述正统观始于何时，而当中夷夏之间的主客地位是以什么做定义。而到了北宋为什么这种观念会被动摇、天下的观念如何变成有国界的中国。接下来，我会论述北宋关于正统观巩固其国的重要。第二节里，我会以欧阳修重新诠释的正统观作论述。他的正统论是应撰写史书的要求而作，另一方面则是为北宋政权的承接做合理的解释，因而提出“绝统说”新颖的看法。第三节里，会连同正统观里前期固有的五行理论及欧阳修的天人观来论述欧阳修关于天人相分的看法。论述他在驳斥天人感应、批评讖纬迷信之后，最终把治理国家的立足点放在人事的观点。

关键词：欧阳修、《新五代史》、春秋学、正统论

致谢

本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必须感谢我的导师方美富老师。在处理论文的这段时间里，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思路是非常狭隘的。对此，方老师并没有感到不悦，反而还循循善诱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且不时给予我勉励。关于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必须在此致以方老师万二分的谢意。

此外，我要感谢父母对我的栽培之恩，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还有众位好朋友的支持下，得以让我在这段难熬的岁月里，能够苦中作乐。顺利完成大学这最后阶段，当真需要谢谢你们，尤其是我的父母及方老师。

前言

众所周知，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世人知其文学造诣，而忽略了其史学方面。他的《新唐书》、《旧五代史》便是其史学代表之作。在他文学造诣极深下，史学特色会具有文学的影子，苏轼曾经提到欧阳修的为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¹这就表示出其《新五代史》笔法必然有其不一样的地方，这点吸引到我对欧阳修的关注。唐代以后，中国人修史都是官修的，若私撰的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了。在这里者的注意的是，他撰史不是官方要求的，也不敢令人多知。这一点便是我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值得去研究的原因。

欧阳修是一位文学家、政治家及史学家，这与很多北宋的士大夫一样，拥有多种的身份，这与儒家文化在这段时间兴盛有关，加上政治环境的开明，所以文化政治各领域都得以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欧阳修私下撰史便可放下心头大石，避免了统治者的秋后算账。其史必能随心所欲而写，这就与官修的有心态上的差异了，官修的撰写者往往会应统治者的需要，或应国势的情形下，而撰写出一部合统治者口味及维护新政统治的史书。我认为，欧阳修排除了这点，其《新五代史》必然是反映出其时代背景的最佳写照。

¹[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三十册，列传第七十八，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10381。

研究北宋欧阳修等士人及其《新五代史》需要用到许多一手资料，如、《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史》等。由于阅读这些古文时能力有限，不能捉住要点，所以需反复阅读以便于运用在论文里。另一方面，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当中，无法突破局限的思维，以致论文中所述多是陈腔滥调，多是前人论述过的，我仅是加强其论点而已。欧阳修是一位面面俱到的史学家、文学家，所以研究其史学时必然会掺杂其文学观点，在这里，由于对他的古文运动认识有限，以至于他的“以文入史”的叙述仅是带过，无法加深其内在理路。以上的种种难题便是我做欧阳修及其《新五代史》所遇到的困境。

在这份论文中，我会围绕着北宋中叶时期关于士大夫在政治里所扮演的角色与前朝有何不同，同时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作为见证这一变化的产物。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士大夫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出其焦虑的感受。其中，欧阳修便是以《新五代史》里的春秋笔法及其正统观来表达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这是在宋中叶内忧外患的焦虑下，作为一种应对的态度而呈现在其著作里，而史作是其中一种，当然也是最盛。

宋朝或以后研究《新五代史》的专著主要有：宋朝徐无党撰的《五代史记注》，他是欧阳修的学生，深得欧阳修的撰史的笔法。《五代史记注》是随《新五代史》附注，以阐明书法要义为主要，参考价值不大。宋朝吴缜《五代史记纂

误》，其书主要以《新五代史》本身前后校对，发现矛盾，所纠《新五代史》之谬 200 余条，今存 120 条，可为读《新五代史》的参考。

除了以上专门研究《新五代史》的书外，在许多学者的笔记、考史专著都有提及对五代史事、史料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如宋朝洪迈撰的《容斋随笔》、清朝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清朝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

今人没有研究《新五代历史》的专著，但在史学史、史籍介绍、传等书中，都有论述，现举其要书。史学史著作有仓修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等。史籍介绍著作有吴树平的《二十四史简要》、徐浩的《二十五论纲》等。在史学家评传著作中有陶慰炳《评欧阳修的史学》、陈光崇的《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以上所举关于《新五代史》仅是一小部份，由于无法博览群书，所以无法大量列出各人各时期关于《新五代史》的研究等著述。

第一章：欧阳修为政态度与宋初政治文化

第一节：《旧五代史》与北宋政治

赵宋建国始于公元 960 年初，当时的人民久经战事，都非常渴望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定他所篡夺的政权。他因兵士拥立而登位，是继唐末五代的第四次，此前的唐明宗、唐废宗、周太祖都是因此而夺得皇位的。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国，正像人们数十年来习见那样，新建的政权转瞬间随风飘散。²唐末五代的政权更易是，“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³、“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⁴。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在将士心目中，并无忠义的观念，在民间更是习以为常。这乃至于当赵匡胤要篡位的消息传入民间时，便出现了“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⁵的景象，所以消息一传出便争相离开，避免生命受到威胁。这便说明了，赵匡胤在当时的百姓看来与前期武将篡位无异，都不是名正言顺的，更不是正义之师。

² 邓小南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页 184。

³ [宋] 欧阳修、宋祁撰：〈兵〉，《新唐书》第八册，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页 1329。

⁴ [宋] 欧阳修撰，徐无党注：〈安重荣传〉，《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页 583。

⁵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1。

赵匡胤登位后，对现状犹感不安，深怕自己重蹈五代之后尘，他言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⁶当时的宰相赵普便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⁷，唐末五代个朝的灭亡皆是由节度使即武将所造成的，夺权后又遵守着前代的军事制度，重蹈覆辙，所以立国最长者也不过是 10 多年就灭亡了。赵匡胤意识到问题的根源，遂有“杯酒释兵权”等军事举动，还有“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治措施，从而保证赵宋的长治久安。赵宋立国之策，无时无刻否围绕着这些问题而设定，总结五代的历史教训，在此混乱之际寻找教训，以史作为借鉴。史书的编撰，无疑是“立国之策”最好的理论根据，因为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五代灭亡的原因，进而采取相对之措施。

重整朝纲乃是当时迫切需要实行的事宜，纂修唐末五代的历史有助于当时的政治要求，旧五代史便由此而诞生。此时，割据的十国尚未完全归降北宋，宋太祖急于纂修梁、唐、晋、宋、周五代史，是想尽快从五代“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教训中找出解决诸侯嚣张、擅权斗争之弊的立国之策。⁸五代史继唐末藩镇割据而形成的一个延续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代。“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⁹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

⁶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二，页 49。

⁷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二，页 49。

⁸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页 756。

⁹ 〈徐温世家〉，《新五代史》第三册，卷六十一，页 762。

三四岁而亡。¹⁰总之，五代是个乱世、社会秩序全无，篡弑相寻的黑暗时代。《旧五代史》¹¹基本上体现了宋初统治者的立场和要求。这部著作一编成，宋太祖立即就亲之阅读，并且在第二天就评论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醜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¹²说明他对编撰这部书的重视，对于五代统治者的迅速灭亡是很深刻的。

另一方面，宋太祖执政后，除面对内忧外患外，在统治思想上亦为之头痛。政治家范祖禹言道：

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祚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

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¹³

三纲不立的情况来到唐末五代更为严重，可谓殆尽。当宋太祖即位后，便以身作则，不仅自己勤于读书，而且还劝诫从臣以读书为治国之道，不可荒废。“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¹⁴宋开国之初，三纲五常、道德仁义

¹⁰ [宋]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本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 862。

¹¹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后来北宋中叶欧阳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记》，人们为了区别两书，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

¹²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十五，页 326。

¹³ [宋] 范祖禹撰：〈唐肃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唐鉴、评鉴阐要，卷十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页 78。

¹⁴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三，页 62。

殆尽，为扭转这一局面，传统的儒家思想便有利于这种局面的改善。所以，当宋太祖即位时便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亦未及武臣一人也。”¹⁵此便是一举两得，一则可以儒代武，解决方镇叛乱困扰百年的问题；二则可重建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以儒治国的思想，发展到宋真宗、仁宗时已步入鼎盛状态，这种读书风气之盛无疑成为了后来北宋史学发展的动力。

第二节：《新五代史》与北宋政治

前一节提到，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撰写前代史有助于统治者巩固朝廷，提供治理国家的理论根据。而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既不是统治者要求，且又不敢令人多知，那他所撰之史究竟有何用意？对于这个问题得从欧阳修前期或同代史家对于先前史书的评语或宋初局势看法找出一点儿线索。

欧阳修前期的史家陶岳在其《五代史补·自序》言道：“其史书漏略尤甚，近年以来，议者以国家诞膺宝命，廓清区宇，万邦辐辏以入贡，九流风动而观政，五代之书必然之作”¹⁶、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原序上言道：“然自梁至周君臣事

¹⁵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十三，页 293。

¹⁶ [宋] 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南京：杭州出版社，2004年，页 86。

迹，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简牍漏略，不有纪述，渐成泯灭，善恶鉴诫，岂不废乎”！以上对于薛居正等撰的《旧五代史》评论一直到欧阳修时代乃不绝于耳，对于修正《旧五代史》的谬误己是有识之士共同的心声。然而，这只是欧阳修有志于修史的外部原因，而促使他修《新五代史》的内部原因恐怕就是他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应宋初局势所需，还是作为士大夫的一种责任，依当时的情况而言，两者必然是不可分割的。

综观各朝，国家统一后数十年便是欣欣向荣之景，而宋朝恰反，尚未经过强盛，就迈入中衰阶段，欧阳修对他身处的时代是这样说的：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将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¹⁷

宋朝内部时有民变、兵变等的发生，它的情况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¹⁸，对此朝廷上下，莫不惊恐万分。另一方面，辽、西夏等外族始终是宋的外患，正统地位随外族的军事势力而有所动摇。这是局势所需，欧阳修撰修与《旧五

¹⁷ 〈本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六十，页 863。

¹⁸ 〈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欧阳修全集》第四册，卷一百，页 1539。

代史》一样，同为巩固稳定朝廷所需的一个指引。这就如钱穆先生所说：“时代衰，史学会盛，好像一个人，跑到前面无路，发生了问题，会回头过来看，那就是在衰乱世史学会盛的一番理由了。”¹⁹ 关于这点，在当时即是史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的欧阳修、司马光等无疑体会良多，他们往往在自己史学撰写时会加入政治观点。

另一方面，关于士大夫的责任来到了宋朝有了一个新的诠释。以政治思维而论，宋代士大夫的“创造少数”从一开始便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次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²⁰。这是因为长期武人挑起的战乱，而促使文治的普遍要求，文人掌政，进而促使儒学复兴的动力。这种以儒治国的观念到了宋朝其实已有所转变，而这一转变可从范仲淹的政治观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古帝王与妄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理念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²¹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²²作为士大夫应有的一种意识。欧阳修在《神道碑》说他“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²³，即使他为母亲守丧期间也不忘记国家大事，“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

¹⁹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页219。

²⁰ 余英时著：《史家、史学与时代》，《余英时文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89。

²⁰ 《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欧阳修全集》第四册，卷一百，页1539。

²⁰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219。

²⁰ 余英时著：《史家、史学与时代》，《余英时文集》第1卷，页189。

²¹ 邓小南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420。

²² [清]范能睿編集，薛正兴校点：《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上册，2004年，页169。

²³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一》，《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二十一，页333。

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²⁴。正如钱穆先生早就指出那样：“这已是一种时代精神，早已隐藏在同代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²⁵此时士人的处世态度较之唐五代已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于忠义观，这可由唐太宗与欧阳修对忠义观的看法来了解。唐太祖言道：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²⁶

从上文可知，唐末五代忠义仁德的沦落，非无迹可循，这是作为唐及五代人为官观念上的一种承接。这种观念在五代发挥的淋漓尽致，遂物极必反。而欧阳修对忠义观的看法可在其《新五代史·冯道传》得到结论，他言道：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²⁷

²⁴ [元]脱脱等撰：《范仲淹列传》，《宋史》第三十册，卷三百一十四，页10268。

²⁵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558。

²⁶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34。

²⁷ 《杂传第四十二》，《新五代史》第二册，卷四十二，页611。

唐朝君臣对于忠的概念的理解相当宽泛，对有功的文武臣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忠臣，而唐太宗身边的宰相魏征便是一个例子，魏征先后换过五个主人，终成贤臣美名。²⁸考其功绩，魏征与冯道皆是贤臣，同是一生事多主，然而，到了宋朝贤臣的观念已有所改变。称为贤臣的前提上必须忠于一朝或一主。宋真宗言道：“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²⁹到了宋仁宗时期则将这种观念完全排斥，由明哲保身变成以治天下为己任的一种变化。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也是为了治天下找出一些根据，同时借此以宣扬儒家积极入世的一种精神。若说欧阳修撰修《新五代史》的对象是统治者，为统治者巩固其势力，倒不如说这是为了广大的百姓服务，自觉性的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³⁰的儒家精神。

²⁸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57。

²⁹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册，卷六十五，页 1461。

³⁰ 〈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上册，页 169。

第三节：欧阳修以《新五代史》揭开朝廷的真相

宋代较为开放的时代气氛里，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左右着时局与世风的趋向。苏轼提到：“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³¹”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济世精神的复振，使得士大夫们的批判意识、参谋意识空前的高涨，蔚为渗透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时代风气。³²

北宋中叶是文风转变的时期，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

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

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庐

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

³¹ [宋] 苏轼撰，傅成标点：〈上神宗皇帝书〉，《苏轼全集》第二册，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142。

³²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57。

矣。³³

到了范仲淹、欧阳修的时代更把文章之道，作为统治优劣的标志，对时代的好坏产生主要的影响。³⁴在古文还没流行前，前期的雕琢文风的西昆体非常兴盛，欧阳修认为这样的文风对正一代之风气是无益的，所以提到：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³⁵

在欧阳修看来，文章的内容可以正一代之风气，改变人民的思维，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士大夫吏能的标准。他对政治曾经言道：“昔三代之为政权，皆圣人之事业，及其久也亦有蔽。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³⁶，在欧阳修那一代人应考的时候，许多他们的老辈人仍然相信文学水平在宋朝建立一种文治秩序是必不可少的。

³⁷他认为久必生蔽，贵能善变而施以救，虽三代圣王犹不免，因此他在学术上的兴

³³ 〈文苑一〉，《宋史》第三十七册，卷三百三十九，页 12998。

³⁴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页 175。

³⁵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23。

³⁶ 〈为君难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七，页 293。

³⁷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页 197。

趣，便转于史学。³⁸在史学上，欧阳修以儒家哲理来改造史学的开拓者，他运用文学上的“文以载道”的观点来撰写其史，与“以史为鉴”的鉴戒派史学主张有很大的不同。欧阳修撰史的目的已改变，除“以史为鉴”作为前提下，而进一步重视内心道德的发觉，并不仅仅局限于为统治者巩固其政权而已。

欧阳修借助《新五代史》来暗谏君主，在其本纪里赞扬了唐明宗与周世宗。在唐明宗即位时，他言道：“春秋已高，不迹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³⁹，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君主。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唐明宗在政策上的诸多错误，如宰相安重诲、任圜先后被诛，孟知祥割据四川事，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归结为唐明宗的“性果，仁而不明”，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将好的建议束之高阁。⁴⁰对于周世宗的功绩，欧阳修是给予十分肯定赞赏的。他言道：“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⁴¹，尔后在区区的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振懾”夷夏，定正乐，议刑统。⁴²在欧阳修看来，周世宗不仅在即位方式上不存在篡弑的道德缺陷，而且在对内、对外的壮举成就无不以大加赞赏。其实，欧阳修对周世宗的评价与事实不尽相符，事实上周世宗存在着“禀性伤愈太擦，用刑失于太峻”的品格缺陷。

³⁸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页10。

³⁹ 〈明宗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六，页66。

⁴⁰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191。

⁴¹ 〈恭帝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二，页125-126。

⁴² 〈恭帝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二，页125。

欧阳修对此两位前朝君主的失实撰写，实有其用意。针对唐明宗的“仁而不明”，实则是影射当时的宋人宗，虽其宽松开明，但是在朝廷的重要政策时并不能掌握得当，以至迟迟未能在政策上定案。对周世宗的刻意赞赏，无疑是针对当时庆历新政的真实写照，“贤良放逐，奸邪当道”，作一个对比，既是对宋仁宗的婉转批评，又是宦海沉浮后的欧阳修对当时政治的痛心疾首。⁴³至于，欧阳修故意突出周世能够威震外夷的事绩，实可说是对宋仁宗的期待，期待宋仁宗能够振作起来，以统一天下为志。

欧阳修借助《唐六臣传序》里唐末“白马之祸”来影射当时朝廷反对新法的人。唐末，当时的宰相裴枢不肯将太常卿一职授予朱温的客将张廷范，朱温借此将裴枢等一班忠臣义士杀死，唐朝贤臣为之一空，此后大唐江山便拱手献给了朱温了。欧阳修认为唐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贤臣被铲除殆尽，在朝者皆是“庸懦不肖、趋利卖国之徒”，否则，这些人不会“蒙职忍辱于梁廷”。⁴⁴此处不难看出欧阳修借《新五代史》对吕夷简等人的暗讽。在庆历年间，革新派即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与保守派即吕夷简人当中的斗争已经到了楚河汉界的地步，已无周旋的地步，任何一方胜利，代表着落败那方将会全军覆没，即被贬谪。这始源于吕夷简用朋党的方式将对方一网打尽，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做出《朋党论》一文以保其革新派的势力。欧阳修以汉唐为鉴，发出“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

⁴³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93。

⁴⁴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94。

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的感慨。⁴⁵

以上这些例子都显示出欧阳修对于当时朝廷斗争的痛心，一方面以《五代史》表现其不满当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又无力挽回当时的局面，深感哀叹。

⁴⁵ 〈苏循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五，页 382。

第二章：《新五代史》的史学观

欧阳修的史学，得于春秋学观念特深，其参修唐书、私修五代史，皆可谓其春秋学运用于当代之具体表现；而在春秋里又可发觉其正统论，提出新的观点，对后世带来很大的影响。关于正统论，我将会在第三章提及。

第一节：欧阳修之春秋学

春秋学在北宋时特别兴盛，那为何会特别兴盛，谁又是倡导者呢？春秋学的何在宋朝特别兴盛，那得从它的发展情况来探讨。孟子言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⁴⁶。发展到汉代，作为解《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充分被利用，《公羊传》里“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尊王攘夷思想被沿用到《春秋》里，董仲舒更把天人感应说渗透到春秋学去。司马迁又言：“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⁴⁷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出于他崇高的抱负和理想，后来这种思想被理解成“义”的表现。春秋学轮廓至此大致已形成。

⁴⁶ 杨伯峻：〈滕文公章句下〉，《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155。

⁴⁷ 张大可注释：〈太史公自序〉，《史记新注》第四册，卷一百三十，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页2137。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以孙复作为启发欧阳修春秋学来探讨。以上由《春秋》学所蕴含的思想，来到了北宋时期，一些被经学者吸收，一些则被排斥。天人感应这迷信思想到了欧阳修时便没落，这与他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对于这种迷信思想的排斥有关。程颐曾经在其《回礼部取问状》言道：

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⁴⁸

从这条资料看出，《春秋》学或许不是源于孙复而出现，但其兴盛则不可不说是他贡献。孙复认为《春秋》仍是治国最好的典籍，关于孙复对《春秋》的态度，欧阳修言道：“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⁴⁹欧阳修对于经学的启发，应是从孙复这里得到，对于疑传也是由孙复那里开始。欧阳修本身也深有体会言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⁵⁰。孙复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舍传求经”会带来主观性的弊病，所以他又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他认为“文”应该为道所用，“文”

⁴⁸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回礼部取问状》，《二程集》上册，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568。

⁴⁹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三十，页458。

⁵⁰ 《春秋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八，页306。

是道之用也；而道便是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然其种类甚多，但都是同归于道，可以称之文也。

他以《春秋》等经是圣人之文，是解释道之言，必须文道致用，务实以求道。

《文渊阁四库全书》提及“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⁵¹，欧阳修以春秋学融入史、以文入史的特点便由此而来。

另一方面，而在经学中，宋人又特别重视《春秋》，因为宋朝时继残唐五代而兴，对于藩镇割据的纷乱，君臣之义，蛮夷之防与忠义廉耻的遗祸、诛伐乱贼，这种政治思想，对于巩固新兴赵氏政，显然有其重要的意义。⁵²司马光言道：“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⁵³由于局势的需要，孙复撰写了《春秋尊王发微》，以维持君王的统治。他言道：“夫礼乐、征伐者，天下国家之大经也，天子尸之，非诸侯可得专也。诸侯专之，犹日不可，况大夫乎？故孔子从而录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围入、取灭，皆诛罪也。⁵⁴在这里，孙复借助孔子而表达出对不敬于天子的诸侯等需“正以王法”。关于攘夷他也言道：“桓公图伯，内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

⁵¹ [清] 永瑢、纪昀等编纂：《春秋尊王发微》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2。

⁵² 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社会，1993年，页143。

⁵³ [宋] 司马光编著：《周纪一》，《资治通鉴》第一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3。

⁵⁴ [宋]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收入[清]永瑢、[清]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页6。

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⁵⁵孙复尊历史上的周天子，因该就是为了尊奉现实社会中的宋朝皇帝。他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当时的宋朝外患是息息相关的，辽、西夏等外敌令士大夫坐立不安。《春秋》学的提倡有助于稳定政局，这同时也开启了北宋时期史学家以《春秋》学为指导的思想来撰史。

欧阳修的作史里的春秋笔法，便由以上大背景而形成。他也以“圣人”自居，用《春秋》书法对五代乱世进行诛伐，从而达到正本清源。⁵⁶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学发展到宋代，并不限于诛伐乱臣贼子的作用，无道的天子也同样的被批评的范围。余英时先生曾经提到：“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惧便是《春秋》确曾为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⁵⁷这种力量的加深形成，应是源于宋代的文治发达，春秋学应用在政治里所形成的一种理念。

⁵⁵ 《春秋尊王发微》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页 48。

⁵⁶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年，页 49。

⁵⁷ 余英时著，彭国翔编：〈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会友集》，台北：三民书局，2010 年，页 320。

第二节：善寓褒贬书法

作为春秋书法的奠基者孔子，我将会以他的作史方式来说明欧阳修作史的态度。孔子的写史方法表现于他的史义，即后来的春秋笔法。孔子在作《春秋》时，于史文史事而外，特别重视史义，史义以简驭繁，便是易理简易之易。⁵⁸以上史义中的“义”，以史学术语而言便是一种“书法”，或称为“笔法”，孟子言道：“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⁵⁹。欧阳修本是一代文宗，其文“法严词简”与春秋书法中以简驭繁可谓相得益彰，遂其《新五代史》篇幅上虽不及《旧五代史》一半，但却能将史实大致表露无遗。

据甲凯先生在其《史学通论》一书指出，孔子作史的态度和方法，可表现于实录、明是非和寓褒贬。此处，我仅取之明是非与喻褒贬述之。（一）明是非。孔子作史常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将事情明朗化，例如僖公二十年记：“齐人、狄人盟于邢”⁶⁰。这件事是说齐孝公与狄人会盟的不对，所以书中称齐人，而不称为齐侯，这具有明辨是非，予以贬抑的意思，这种笔法在《春秋》中所在多有，例不胜数。（二）寓褒贬。孔子所处时代也与五代时无异，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

⁵⁸ 甲凯著：《史学统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页206。

⁵⁹ 杨伯峻：〈离娄章句下〉，《孟子译注》，页192。

⁶⁰ 承载撰：《春秋谷梁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267。

之，国法失效，邪说暴行、乱臣贼子，张狂无惧，孔子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的分别崩、卒、弑、杀、侵、伐、入、救等字的差异。“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⁶¹这可以说是大张鞑伐以示微劝。孔子的史学，旨在经世，所以其《春秋》都是求事与理的合一，⁶²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史学科称得上继承了孔子作史的态度。

五代是用兵时代，在《新五代史》里如说军事，欧阳修会用“攻、伐、讨、征”四字来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以大压小，以大国攻一小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对方确实有罪称讨；天子自往称征，这些都是春秋笔法。⁶³这就是取法了《春秋》里一字定褒贬的遗旨。如《新五代史》里关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战事，言“广顺元年十月汉人来讨⁶⁴、显德元年二月汉人来讨、显德元年三月，如潞州以攻汉”⁶⁵等字眼。北汉攻打后周，称为“讨”而不书“寇”，实际上是把北汉的军事行动视为正义的讨伐，理屈在后周；后周攻打北汉，书“攻”而不书“征”，言外之意，理屈也在后周。⁶⁶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作也”⁶⁷欧阳修通过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意在暴露周太祖以下犯上、弑君篡位的不义之举。

⁶¹ 〈太史公自序〉，《史记新注》第二册，卷四十七，页 1187。

⁶²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 224。

⁶³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 224。

⁶⁴ 〈太祖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一，页 113。

⁶⁵ 〈世宗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十二，页 118。

⁶⁶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134。

⁶⁷ 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社，1993 年，页 143。

五代之乱，先乱于君心，继乱于朝政，后天下百姓亦然。欧阳修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春秋》书法大义便为他所用。他言道：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⁶⁸

欧阳修为了改变道德仁义的陷落，认为非常时期得用非常法。他在记事之后仿前代发论时，一改前代的作风，不用“臣曰、论曰、赞曰”等形式，而直接以“呜呼”开头，意喻五代之事都值得哀叹，这与《旧五代史》在记事开头发论就很大差别了。《旧五代史·唐书》曰：“史臣曰：《易》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如毛璋之侏，可谓积恶而灭其身矣，况温韬之发陵寝，段凝之败国家，罪不容诛，死犹差晚。余皆琐琐，何足议焉”⁶⁹，这里《旧五代史》只是作简略的评论，不再展开论述。而欧阳那个修在《新五代史》发论时曰：“呜呼！死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义不苟生尔。故曰：主在与在，主亡与亡者，社稷之臣也”、⁷⁰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

⁶⁸ 〈王建立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四十六，页514。

⁶⁹ 陈尚君辑纂：〈李邕列传〉，《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六册，卷七十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2237。

⁷⁰ 〈元行钦传〉，《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二十五，页273。

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⁷¹两者所评论的方式都不一样。欧阳修本是严谨的学者，对五代十国的全面偏责、盖缘于其评价标准是礼仪名分，他私撰史书就是为了一种道德责任，通过声讨乱世，总结教训，达到正名分的目的。⁷²

另一方面，在列传上旧新五代史有明显的差异。《旧五代史》以死于某朝或以事迹多寡就列入某朝传内；而《新五代史》则以专士一朝归入那一朝，士于两朝或以上的就另归入杂传。由于各朝立国短暂，所以《新五代史》的杂传占全书卷最多。他在《新五代·史名臣传》卷首序云：

呜呼！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⁷³

⁷¹ 〈郑遨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四，页 369。

⁷² 张国刚等撰：《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2年，页 375。

⁷³ 〈梁臣传第九〉，《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二十一，页 207。

陈寅恪曾经在其《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众所周知”。⁷⁴欧阳修此举是为了“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⁷⁵，让乱世中能够识忠臣、时变见人心、的观念能够表露无遗。贤臣的定义不再只是治世之良才，且需忠于一君一国才称得上贤臣。

第三节：《新五代史》求实精神

《旧五代史》之成，是以范质所修《五代通录》为底本，取五代各朝实录而成。赵翼对此言道：

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

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⁷⁶

其长处在于保存了丰富资料，短处在于沿袭了一些捏造出来的皇家装饰方面的谎言，如把朱温的始祖硬说成是舜臣朱虎，“其先，舜司徒虎之后”⁷⁷把本无名氏的沙陀部贱民之后石敬瑭强称为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石碣后裔“本卫大夫碣、汉丞相奋

⁷⁴ 陈寅恪著：《寒柳堂集》，《陈寅恪集》，台北：三联书店，2009年，页182。

⁷⁵ 《郑遨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四，页370。

⁷⁶ [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二十二史劄记》卷二十一，页300。

⁷⁷ 《太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一，页3。

之后”。⁷⁸欧阳修纠正了许多不符合史实之词，言道：“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⁷⁹这边大大得贬低了各朝篡位者的来历身份，这可让后人得知他们并不是凭其祖荫而得天下，仅是乱臣贼子矣。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靠武力拼杀获得政权。从政权获得方式看，均非义取，因此，五代政权的建立者都成为《新五代史》评击对象。如五代第一个政权建立这朱温自然首当其冲。欧阳修言道：“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着其大恶而不隐欤？”⁸⁰以下举新旧五代史对朱温弑君等暴行描述做对比。

在《旧五代史》记载唐昭宗被弑的情况是这样的“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祝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于永寿，邠军不出”。⁸¹如此撰写就看不出朱温有任何行弑的不义行为了。欧阳修采取“不没其实”的春秋笔法，将朱温的暴行一览无余地暴露天下。“遣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师，杀朱友恭、氏叔琮；二年二月遣蒋玄晖杀德王裕等九王于久曲池。六月，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⁸²另外，关于朱温的滥杀无辜在《旧五代史》里也轻笔带过，后来的情形也不加理会，“十月辛巳，护驾都

⁷⁸ 〈高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七册，卷七十五，页 2257。

⁷⁹ 〈高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七册，卷七十五，页 2257。

⁸⁰ 〈中宗本纪〉，《新唐书》第一册，卷四，页 113。

⁸¹ 〈太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二，页 88。

⁸² 〈太祖本纪〉，《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一，页 9。

指挥使朱友伦因击鞠坠马，卒于长安。讣至，帝大怒，以为唐室大臣欲谋叛己，致友伦暴死。”⁸³这只记载了朱友伦之死，而在《新五代史》中对此描述比较全面，除记朱友伦之死，后添加了“王怒，以为崔胤杀之，遣朱友谦杀胤于京师。其与友伦击鞠者，皆杀之”⁸⁴。这里就看出《新五代史》较能恰当的揭露朱温的暴行，这便是欧阳修所要提倡的“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用意深而劝诫切，为言信而善恶明”⁸⁵的惩劝作用。

为了突出“正乱君”的目的，欧阳修在史料取舍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失误，并非真正做到了“不没其实”，在撰写梁本纪的时候，忽略了“朱梁轻赋”等之善举，有时候还会因其对历史人物的“乱君”定位而导致他在史料和选择人物评价上的极端走向。关于这点王鸣盛云：

春秋出圣人之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矣，莫能窥探，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壹意删削，若非旧史出，几叹无证。⁸⁶

⁸³ 〈太祖本纪〉，《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二，页78。

⁸⁴ 〈太祖本纪上〉，《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一，页9。

⁸⁵ 〈太祖本纪下〉，《新五代史》第一册，卷二，页21-22。

⁸⁶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新旧五代史一〉，《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865。

杜维运先生对此又有另一番见解。他认为极乱的五代，人类的文明已濒临灭绝的边缘，史学家蒿目伤心，以沉痛之笔，现其真相，而寓褒贬之意于其中，其功在扭转一代风气，而使人类走向文明，不仅限于史学本身的成就。⁸⁷我相信欧阳修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介意他人对他撰史有欠公允的职责，反而在意于他的“正一代之风气”思想是否得以发扬。

⁸⁷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台北：杜维运出版，2002年，页94。.

第三章：欧阳修的正统观

正统论虽主用于宋朝，但是追溯它的思想却很深远。探究正统的思想主要有两端：一是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一是五德始终说的理论。前者和孔子的正名主义有关，后者则来自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⁸⁸此处，笔者将会以春秋学作为欧阳修正统之发端，而关于五德始终说的理论将会从下一节与欧阳修反对天命、迷信的思想加以论述。

第一节：正统观之发端

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原诸夏部族为正统，四夷为附庸的理念就已经萌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已经形成。⁸⁹孟子言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⁹⁰这种夷夏之辩的概念至少已在春秋战国时出现。唐代皇甫湜认为中国的定义，便是礼仪也，所谓夷狄者，便是无礼仪也。在这里看出夷夏之间的分别在于是否有礼仪，换句话说，文化便是取决于两者的主客地位。不仅中原地区华夏族如此看待自己、鄙视四夷，周边四夷民族自己也认同这种民族差异，《战国策

⁸⁸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页30。

⁸⁹ 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史学研究理论》2005年第2期，页14。

⁹⁰ 〈滕文公章句下〉，《孟子译注》，页125。

除策三》载：“楚王约：“楚，僻陋之国也”。⁹¹从这里就看出这时期还是以卑微的身份自居，所以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至此还没动摇。对于外族的观念，北宋之前各朝的态度都是

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

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⁹²

这种轻视态度是建立在文明的礼仪制度及道德文化。显然，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由于相信天下并没有另一个足以与汉族文明相颉颃的文明，因此相当自信得愿意承认、凡是吻合这种文明的就是夏，不符合这种文明的则是“夷”，这个时候，国家民族因素、空间和边界因素都相当地薄弱。⁹³到了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了。

北宋前期的外患契丹已经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军事实力与文化与往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经过多年的时战时和已经消磨了统治者对夷狄观念的差异，后签

⁹¹ [汉] 刘向集录，范祥盦证：〈楚三〉，《战国策盦证》上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848。

⁹² [汉] 班固撰：〈匈奴传上〉，《汉书》第十一册，卷九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页2790。

⁹³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页7。

订的“澶渊之盟”辽宋为兄弟之国，天下的观念已与辽二分。事到如此，北宋的文化、民族优越感已岌岌可危了。

军事上连番失利、领土已与汉唐时大打折扣，唐初时天子作为万国之主的天可汗更令北宋望尘莫及。问题来到这里，如果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可整装再战，正统的地位不足以严重的动摇，但是问题在于汉人一向来的文化优越感自唐五代以来已殆尽，此时道德礼仪已陷落。葛绍光先生认为：“这使得很多士大夫开始担忧道统的失坠，尤其经过唐代的变乱，经过五代的纷乱。历史记忆一直困扰着他们，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确认“正统”以抵御“外患”，重建“道统”以对抗蛮夷之文化侵蚀的问题。”⁹⁴所以在宋朝才会出现重文轻武，以此来寻回本民族的根与文化。

来到宋仁宗这一代，本民族的文化已经从提倡儒家思想上复苏，所以当西夏欲自比契丹，与中国对抗，以成分庭抗礼之势时无不触动众多士大夫的心，认为契丹已是一个耻辱，不可再而挑战宋作为正统的地位，所以欧阳修言道：

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起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

⁹⁴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页9。

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
实者何也？⁹⁵

这句话显然看出欧阳修认为“中国不尊”才会引发诸多问题的，所以他必须任用春秋大义来尊王攘夷，另一方面以此来提倡道德仁义。这里的道德仁义不仅可对乱臣贼子惧，在欧阳修看来也可挽回失落已久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以此来辨明华夏夷狄之正统观。

后来，政治上的正统之争，影响到史学的方面。陈涛于晋初撰写撰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于“魏书”立本纪，且改蜀汉为蜀，其从魏承汉的宗旨，极为明显。⁹⁶此后，东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尊蜀为正统，视魏为篡夺，自此史上的正统之战，掀起了激战。⁹⁷这样一来，某些朝代的正统地位问题便成为以后史家撰写史作时，感到头痛的问题了。

宋太祖命薛居正编《旧五代史》原因之一在于稳定其政权，加以证明它正统之地位。以东晋为例，它以正统自居，不仅维持了偏安的局面，而且也阻止了外族侵略之心，秦将王孟在临终前便说：“晋虽偏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

⁹⁵ 〈本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六十，页 861。

⁹⁶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页 87。

⁹⁷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页 87。

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⁹⁸从这句话特别能显示出正统的力量。⁹⁹后来，由于北宋对外战连年争失败，遂有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伪造天书，大行封禅，以示天命所归，来增强自己的声望。蒋复璁曾经指出：“天书一事，从表明上说是对辽雪耻，表示宋有天命，实际上是对内，因为天有二日，民有二主，不能不做点解嘲工作。¹⁰⁰正统论之起，亦与北宋国势衰落有相当关系，因为这些论说都是在北宋中叶以后大量出现，而起目的在重建儒家政权“合法”性理论，试图以传统的道德至上的理念，阐明宋朝在中原文化的优越地位作为弥补对外政策的失败。¹⁰¹这种不安的情绪围绕着整个宋朝，外族进一步的胜利，无时无刻都动摇着整个宋朝正统的地位。

第二节：正统观之新义

前一章已经提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极乱之混世，他唯有借其《春秋》一书以达到“尊王室、抑诸侯”的效果，而达到大一统的局面。他言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从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¹⁰²这表现在政治里便是正名的观念，这便是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天子的正位，其他自封王号的，皆不能取代。但是来到北宋这种观念开始动摇，这已如前所述。

⁹⁸ 〈晋纪二十五〉，《资治通鉴》第七册，卷一百三，页 3269。

⁹⁹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页 32。

¹⁰⁰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页 38。

¹⁰¹ 陈学霖：《宋史论集》，页 145。

¹⁰² [清] 刘宝楠撰：〈季氏第十六〉，《论语正义》上册，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页 651。

欧阳修正统论之形成，一方面是应撰写史书的要求而作，另一方面则是为巩固北宋政权而作。在史书的方面 欧阳修将“正”与“统”分别解释，言道“君子大局正，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¹⁰³“居正”是指道德操守，修法持正；“一统”则是纪元开创，武力统一。两者可以单独存在，超出了《春秋》大义中两者并存始配正统的说法。¹⁰⁴欧阳修提出“正统有时而绝”，言道：“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¹⁰⁵这一新理论自此取代了汉唐间盛行的“五德相生”说，成为裁断政权继承的正当或合法性的主要根据。尔后，他将正统论分为四个情况而说，正统之得不得各具其二：

一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二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三是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时奋起而争天下，而立不能相拼。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东晋、后魏是也；四是始终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正统遂绝。魏、五代是也。¹⁰⁶

¹⁰³ 〈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7。

¹⁰⁴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页 34。

¹⁰⁵ 〈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7。

¹⁰⁶ 〈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9。

欧阳修将正统论分为四种情况而言，无疑是要排斥五行相生说及汉初李昉把梁归入僭伪等不实之论加以纠正。北宋时期最先讨论正统思想是始自《册符元龟》，它所叙述的正统观念充满迷信，它的立论以五行学说为基础，认为历代各朝的正统是“乘时迭起、上承天统”，接近政治神话。¹⁰⁷书中把中国历代的演变分为正统、闰位和僭伪，所谓正统即是指周、汉、魏、晋、后魏、北周、隋、唐、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闰位是指秦、蜀、吴、宋、齐、梁、陈、东魏、梁；而僭伪是豪杰窃起以蓄乎覬觐，强弱相凌分割乎土宇，虽政今之自出，非运序之所系，如刘渊、石勒都属于僭伪。此后，编撰的《旧五代史》也采取类似的编排，更把梁归入僭伪，而又将至列入本纪，他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的修史，于理不安，对这种“政乱之迹，不可不辨”。关于正统的地位历代以来有三个时期令人模糊，即周秦之际、东晋魏汉之际和五代之际。此处，我仅以即周秦、东晋魏汉之际作论述。

他为秦朝之非正统地位平反，言道：“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纣、桀，桀纣不废商周之统，则始皇未可废也”。¹⁰⁸秦之所以被黜为闰位，一方面是汉儒自私之说，一方面是迷信者的偏见，因为秦之兴起，皆由于秦前期能够有效治理自己的国土，都是在朝代衰微时取而代之，不应该视秦始皇一人之残暴，而忽略了前代之功。如果因秦始皇一人之暴虐将秦朝否定了，此前的周、夏也应一拼否定。在梁为伪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若伪梁，此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受禅于周的

¹⁰⁷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页 39。

¹⁰⁸ 〈秦论〉，《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81。

宋也并非合法的政权。故此，他反驳说：“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¹⁰⁹所以把梁视为正统。欧阳修的《正统论》一书中即阐明五代为绝统时代，而在其《新五代史》又为其立本纪，并不伪五代各国，不免自相矛盾。

在梁是否为正统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¹¹⁰，并提出

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奋当，而正统明。¹¹¹

这就是说，“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¹¹²只否定梁篡唐的方面，而不否定梁作为一个朝代存在的事实。欧阳修创立的正统论有效使迷信的思想消失，有助于统治者以务实的政治态度处理国事，但实则于《旧五代史》为宋立正统观无异，皆不能自圆其说，在形式上对宋的正统地位无多大帮助。

¹⁰⁹ 〈或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7。

¹¹⁰ 〈明正统论〉，《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78。

¹¹¹ 〈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70。

¹¹² 〈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74。

第三节：天人相分思想

此前一节关于正统论的来源已经说明，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春秋学尊王攘夷大一统思想为依据的，而对另一端的“五德终始”说是加以否定的。后者由于在欧阳修等的排斥下，这一发端在正统论已经日渐衰微。

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念乃相当流行。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建隆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则本朝运膺火德，色当尚赤¹¹³；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¹¹⁴，与此类推，往后正统的继承以五行说并无间断过。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如《册府元龟》中提到：“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¹¹⁵用“历数”、“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

¹¹³ 〈律历三〉，《宋史》第五册，卷七十，页 1597。

¹¹⁴ 〈律历三〉，《宋史》第五册，卷七十，页 1597。

¹¹⁵ [宋]王钦若等撰编，周勋初校订：〈总序〉，《册府元龟》第一册，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页 1。

欧阳修对此大声疾呼，言道：“而谓帝王之兴，必承五运者，谬妄之说也。”¹¹⁶

如他在其承认秦朝的地位是从功业上而言的，而大力反对此前的史家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根据道德，只依据五行终始说就把它黜为闰位的不当行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盛衰当以道德内涵作依据，功业次之，而据道德、功业又是在建立在人事的努力上。他言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¹¹⁷，后以后唐康澄关于为国应有的“五不惧、六深可畏”¹¹⁸的观点来加强关于人事的作用，而逐渐舍弃五行天命对统治的影响。概括地说，为国者对天象灾变不足畏，深惧者是人事上的失误。¹¹⁹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¹²⁰，在这里他否定天意支配万民，但是也提到上天是存在的，认为上天与万民同存而互不干涉。大多数史家解说历史的理论时，并不否定天命论，但分析历史的兴亡，很少谈天命，不赞成以灾异说去牵强附会解释历史的变动，认为言灾异须达到理。¹²¹欧阳修关于史书撰写脱离了天命观这一因素开启了后来宋朝理学的发展，关于这点我将不予之叙述。

¹¹⁶ 〈秦论〉，《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卷十六，页 268。

¹¹⁷ 〈伶官传〉，《新五代史》第二册，卷三十七，页 397。

¹¹⁸ “五不惧”是指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六深可惧是指贤士藏匿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刻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刻畏、直言不闻深可畏。

¹¹⁹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年，页 87。

¹²⁰ 〈司天考〉，《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九，页 705。

¹²¹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页 83。

欧阳修本着春秋意旨的观点，常注意人事、轻天命，言道：

圣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际罕言焉。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见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人事而而。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¹²²

这里否决了天命对万民的影响，对万民直接影响便指向统治者了；而否定了天命对统治者的影响，对其统治直接影响便是万民了。换言之，德政便是支配着两者的存亡关系，欧阳修言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¹²³，两者是共融共存的。欧阳修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要使到统治者重民、爱民，这些才是政权得以延续的根据。

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司天考》公开宣称自己“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¹²⁴生活在内忧外患社会环境和儒学复兴学术背景下，欧阳修开始对天命神话等对统治作解释的情况学已不耐烦，他利用以褒贬善恶著述宗旨下的《新五代史》的本纪，全盘否定了《旧五代史》所记载的有关皇帝出身的种种怪异现象和讖纬迷信。如《旧五代史》里，记载朱温出生时，“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

¹²² 〈易童子问卷一〉，《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卷七十六，页 1109。

¹²³ 〈食货志〉，《新唐书》第五册，卷五十一，页 1341。

¹²⁴ 〈司天考〉，《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九，页 705。

之，皆惊奔而来”，¹²⁵类此例子多不胜数。因此，他在《新五代史》里删除了五代统治者假借天命、祥瑞、灾异政权的记载，而将君主的真面貌为如实编写。

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志”的编撰。他在“志”的编撰只有“司天考”、“职方考”。此处，一些学者认为五代是乱世，认为欧阳修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志”没有重视的必要，而一些学者却认为他对五代典章采取鄙视的态度，颇有舍难取易之嫌。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看出他破除迷信的态度，他言道：“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¹²⁶欧阳修在驳斥天人感应、批评讖纬迷信之后，最终把治理国家的立足点放在人事，而且放在合乎君臣之礼、夷夏之礼及道德的统治上。否定天命论在他看来更具有深一层的意义，即可以否定割据势力以“天命”作为篡夺政权的意义。

¹²⁵ 〈李邕列传〉，《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册，卷一，页3。

¹²⁶ 〈司天考〉，《新五代史》第三册，卷五十九，页706。

结语

在宋代军事薄弱的情况下，后人往往仅是以积贫积弱来形容它，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不堪的朝代，而忽略了其文治发达的一面。究其本源，宋朝统治者是为了革唐末五代之弊，而减少了武功这一方面的事业，进而大力提倡文治以巩固其内部力量。在文治的方面，为了挽救几乎殆尽的道德仁义观，所以倡导道德气节的崇尚、以及重新诠释关于尊王攘夷对巩固政权的作用。

欧阳修活动在北宋中叶，对当时朝廷的境况可谓感触不浅，而其《新五代史》便是反映他在这个时期的感受，同时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征。以春秋笔法撰成的《新五代史》贯穿着欧阳修的忠节礼仪观，这便是以其史宣扬伦理纲常、褒贬忠臣义士、揭露乱臣贼子的观念。这种忧国忧民的观念始于范仲淹等士大夫。在政治上，由于这样的精神发挥，而形成了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聚集在一起，欧阳修便是其中一位。所以，欧阳修的史学著作是与其政治思想息息相关的，在政治上可借由政策上来实行其爱国爱民精神，而在史书的撰写中也可以褒贬忠臣义士，让世人得到正确的价值观，避免道德仁义再次沦丧。

研究欧阳修及其《新五代史》让我了解到整个北宋的政治特色、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以及他史学上一些划时代的观念，如其绝统论及否定天命对人民支配的想法等。作为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以及史学家的多种身份，令我们看见其史学观有异于一般前代学者的看法，使到我们对于其史学更有进一步的了解。

参考书目

古代典籍

1. [汉] 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2. [宋]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 [清] 范能睿編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上册，2004年。
4. [宋] 范祖禹撰：《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
5. [宋]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6. [清] 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7. [汉] 刘向集录，范祥盦证：《战国策盦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8. [宋] 欧阳修、宋祁撰：〈兵〉，《新唐书》第八册，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9. [宋]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0. [宋] 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1. [宋]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宋] 苏轼撰，傅成标点：《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 [宋] 陶岳：《五代史补》，南京：杭州出版社，2004年。
14. [元]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5. [清]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16. [宋] 王钦若等撰编，周勋初校订：《册府元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
17. [宋]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南京：杭州出版社，2004年，页86。
18. [清] 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9. [清]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二十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今人论著

1. [美] 包彼德，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3. 陈芳明：《宋史研究集》，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
4.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社会，1993年。
6. 陈寅恪著：《陈寅恪集》，台北：三联书店，2009年。
7. 承载撰：《春秋谷梁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8. 邓小南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9.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台北：杜维运出版，2002年。
10. 甲凯著：《史学统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11.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2.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
1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页219。
14.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年。

15.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6.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7. 余英时著：《余英时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 余英时著，彭国翔编：《会友集》，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
19. 张大可注释：《史记新注》，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
20. 张国刚等撰：《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2年。
21.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7年。

参考期刊

1. 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史学研究理论》2005年第2期。
2.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